

中国冤案大解密

伍子胥、文种、屈原、吴起、商鞅、桑弘羊、马援、邓艾、崔浩、嵇康、孤信、解忌、寇准、范仲淹、岳飞、元丞相脱脱、李善长、方孝孺、解缙、于谦、杨继盛、杨涟、左光斗、袁崇焕、多尔袞、吕留良、岳钟琪……

袁文才、王佐、柳直荀、熊受暄、陈定侯、曾志、许继慎、段德昌、蔡申熙、旷继勋、余笃三、王炳南、彭真、胡风、俞平伯、彭德怀、贺龙、吴晗、陶铸、刘少奇、刘志新、聂树斌、余祥林、李树红、高莺莺、郝金安、赵作海……

全面揭示中华五千年历史中的冤假错案，还历代冤魂以清白，还中华民族以善良人性。



中国冤案大解密

刘复之 编著

第五卷

中国古籍出版社



颠倒的历史终于被纠正了过来。

许光达同志可以瞑目九泉了。

许继慎案

白雀园里的冤魂

在革命面临最危险的时刻，他曾带着重伤赶赴起义前线；在大别山，他亲手缔造的军队，曾令敌人望风丧胆；在香火岭，他曾创造了红军以少胜多的成功战例……然而，这位叱咤风云、功绩卓著的红军将领，没有死在奋杀敌人的沙场，却在那位早就认识 and 了解他的“同志”手下变成一个冤鬼……

许继慎同志是我军早期杰出的指战员，高级将领，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的缔造者和领导人，在鄂豫皖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位对党和人民立下赫赫战功的红军将领，在1931年10月竟被张国焘一伙枪杀在河南省光山县白雀园，造成了红军史上一大奇冤。

许继慎，原名许绍周，字瑾生，如旦。1901年出生在安徽省六安县土门店一户中农家庭。

学生时代，许继慎就积极要求进步，追求革命道理，与爱国学生一道，抨击反动统治和黑暗时政，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1921年，参加并领导了安徽学生发动的“六·二”运动。在运动中，许继慎联合学生请愿、罢课、上街游行、贴标语、撒传单，组织学生演讲队在大街小巷鼓动宣传，争得了广大工人、商人的支持，取得了“六·二”运动的胜利。

1942年，许继慎经党组织推荐，考入黄埔军官学校，成为黄埔一期学生。在军校期间，他除认真学习各门军事课程外，还积极学习革命理论，汲取救国救民真理，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著作。并在同年经共产党员蒋先云的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立志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军校毕业后，被留校任教。

1925年2月至1927年，许继慎参加了北伐战争。先后任排长、连长，叶挺独立团第二营营长、团参谋长、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七十二团团团长。1927年，由于新军阀

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导致大革命失败。党为了挽救革命，准备在江西南昌举行起义。许继慎闻讯后，带重伤赶赴南昌起义前线。后因前敌委员会决定，负伤人员一律不准参加起义，经九江赴上海养伤。

在上海养病两年中，许继慎同志仍心系党的事业和人民的解放，在党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以个人交友的方式，利用乡土关系，对安徽留居上海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名流上层做统战分化工作，帮助他们识别蒋介石反动派的反动本质。当时国民党也采用多种手段拉拢利诱他，第三党也争取他，他都矢志不为所动。

1930年，中国共产党利用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混战之机，迅速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因而出现了大别山区火热的革命热潮和局面。为加强对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在上海召集郭述申、许继慎、熊受暄等人开会。会上周恩来同志宣布了党中央的两项决定和任命：一是将黄麻、商南、皖西三个根据地划为特别区，建立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别委员会；二是以红三十一师、三十二师和三十三师为基础，组建红一军。任命许继慎为红一军军长。1930年4月初，许继慎和郭述申一起，迅速开展组建红一军的工作，在湖北黄安箭厂河召开了鄂豫皖根据地党和红军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精神，成立了中共鄂豫皖边特区委员会和红一军前敌委员会。许继慎为特委委员和前委委员。会后，许继慎、曹大骏、徐向前等人着手组建红一军。仅用一个月左右时间，组建工作就基本完成。全军有三个师，一个独立旅，共2300多人。红一军组建完毕后，迅速投入战斗，利用蒋、冯、阎混战，根据地敌军防守薄弱的间隙，在淮河上游、皖西、京汉铁路等地与敌军展开了大规模的周旋和战斗。从6月到8月，红一军在许继慎的正确指挥下，大显神通，先后攻占了皖西和京汉铁路南段许多城镇，共毙俘敌军7000多人。红一军也在战斗中经受洗礼，发展壮大。由原来的2300人发展到5000多人，声威大振，根据地人民斗志空前高涨。许多地方相继成立了工农民主政府。

正当红一军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由于李立三错误路线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提出以夺取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武装总暴动行动计划，红一军也被迫奉命沿京汉路东侧北上，进攻中心城市。结果在袭击广水、信阳战斗中，连连失利，部队伤亡惨重。许继慎为避免更大损失，根据实际情况，机动灵活地指挥部队向南返回根据地附近作战。一路上，歼灭反动地方武装，帮助地方建立游击队。10月中旬，在红一军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由于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错误地批评许继慎在领导京汉线作战中“不力”，是消极的“右倾机会主义”，并把许继慎排斥在改选后的红一军前敌委员会之外。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为纠正“左”倾错误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影响，党中央派曾中生任鄂豫皖边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红一军



根据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决定回师皖西，收复根据地。许继慎率军进入皖西后，采取连续奔袭、突然包围、速战速决等战略战术打得敌人狼狈逃窜。仅仅几天，就接连收复了金家寨、麻埠、独山、叶家集、苏家埠等地，包围六安县城，进逼霍山县城。至此，因贯彻立三错误而丢失数月的皖西苏区，得以收复。12月底，皖西、豫南的敌军一个师和三个旅组织对红一军合围。鉴于敌强我弱，许继慎决定主动撤离城填，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在西香火岭，全歼敌人三个团，击溃二个团，毙俘敌团长以下3000余人。香火岭战斗，是红军史上以少胜多，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成功战例。随后又乘胜追击，在商城四姑歼灭逃敌一个团，粉碎了蒋介石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1931年中旬，红一军和红十五军在商南的长竹园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党中央派卞继勋任军长，余笃三任政治委员。许继慎改任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在带领十一师作战中，许继慎指挥有方，机智果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李家寨车站一战，全歼敌军一个旅，当场击毙旅长侯镇华。接着又与蔡申熙率领的第十师协同，突袭包围进驻双桥镇地区的敌军岳维峻师，全歼该师，活捉了岳维峻。这两次战斗，对粉碎蒋介石第二次“围剿”起了决定性作用。

正在红军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剿”、革命根据地勃勃发展之际，王明夺取了党中央的领导权，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这时，张国焘摇旗呐喊，与王明一唱一合，抛出了《拥护四中全会与路线的斗争》一文，因而深得王明的赏识和信任。王明指派张国焘作为中央代表来到鄂豫皖根据地。来到根据地后，张国焘全盘否定根据地的党和红军，宣称：“这里的中共组织简直不象共产党”，“红军中没有真正的党，红军在立三路线时期遭到了完全的失败”；并提出要“改组领导机构”。1931年5月12日，张国焘在新集主持召开特委会议，宣布撤销鄂豫皖特委，成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新的军事委员会，由他担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并同时改组了红四军领导机构？将特委书记曾中生调任红四军政治委员，许继慎担任第十二师师长兼新增设的鄂豫皖军委会西分会主席。中央分局一成立，张国焘更是肆无忌惮地推行“左”倾所谓“新政策”，大搞宗派主义，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动不动就扣上“立三路线”、“军阀土匪作风”，“反中央分局分子”、“反党”等大帽子，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企图“改造”根据地的党和红军，建立他个人在军队中的绝对统治和权威，引起了红四军许多同志的不满。许继慎同志对张国焘的“左”倾错误路线和错误作法进行了坚决斗争。

张国焘早就认识和了解许继慎，知道他是“一个才华毕露的人，爱谈政治”，“对鄂豫皖边区军事上有过很大贡献”，也知道原红四军特委和负责同志很器重许继慎，重视他的军事战略及建议，在红四军的几个师长中，“以许继慎为最能干”。因此张国焘先是企图拢络他，多次找他谈心，征求他的意见。后来由于许继慎的意见与张国焘



所推行的极“左”一套相距甚远，“批评中央一意巩固苏区的政策”，“带有保守的色彩”，主张红军主力应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向外进攻和发展，消灭敌人。对于这些意见，张国焘听了很不顺耳，认为“许继慎表现了军阀主义倾向”，决心“非予以纠正不可”。5月底，蒋介石调集几十万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而对鄂豫皖暂时采取守势。这时曾中生、许继慎从实际出发，多次建议应抓住有利时机向外发展，在敌人对鄂豫皖新的“围剿”尚未到来之际，以主力南下作战，收复岢（春）、黄（梅）、广（济）地区，以扩大根据地，牵制敌人，配合中央苏区进行反“围剿”斗争。张国焘不仅不采纳，反而指责这一正确主张是“立三路线的残余”，坚持所谓“巩固根据地”的方针，极力主张红军要集中全部精力肃清根据地内部的敌人。并毫无根据地讲，红军如果向外进攻，将会招惹敌人向根据地再度进攻的危险，双方发生了争执。许继慎态度坚决，积极主张红军向外发展，许多红军干部都支持他。张国焘十分嫉恨。6月28日，张国焘为了继续推行王明“左”倾路线，强化自己的权威，扩大自己的势力，在新集召开了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开展所谓反对“立三路线残余”、“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实际上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打击报复，进行有计划、有目的地批判和斗争。在这次会议上，张国焘撇开分歧和争论的主要问题，而是抓住许继慎的某些缺点，无限上纲，打棍子，扣帽子，搞人身攻击，指责训斥许继慎“在多方面保有军阀土匪的习气”。曾经重视和支持过许继慎的一些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也遭到了批判、斗争，有的被撤销职务，甚至有的被开除党籍。其中张国焘指责曾中生和余笃三等同志对许继慎的错误“难逃纵容之责”，在红军内部掀起了一股剪除异己的狂热，把一个红四军搞得乌烟瘴气，人心涣散。会后，消息传开，红军和地方的广大党员干部对6月28日的新集会议极为不满，认为会议是“利用‘些枝枝节节的问题，来打击老干部’。而张国焘疑神疑鬼、怀弓蛇影，把红军党员的正确批评和意见，当成是一种反中央局领导的暗流，并认为这种暗流“是许继慎拨弄起来的”。把许继慎的问题升级，从“土匪习气”上升到“反中央分局”和“反党”，把正常的内部争论上升到敌我矛盾，对许继慎及其支持者残酷迫害。7月初，红四军军委再次召开会议，在讨论红四军向外进攻的方向和使用兵力问题上，曾中生、许继慎又一次和张国焘发生了激烈争执。曾中生、许继慎主张红军主力应南下，收复岢、黄、广地区，从而使红军有立足点向外发展，以增加红军粮食供给。他们认为当前蒋介石正在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支持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最好途径就是狠狠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牵制敌人，分散敌人兵力，而不能盲目攻打中心城市。张国焘则不以为然，对于正确的意见和建议根本就听不进去。限令红军在一个月内攻下英山，然后出潜山、太湖，攻打安庆，震动南京。8月1日，红四军攻下英山县城后，徐向前、曾中生和许继慎等军师领导干部经过认真分析和详细



论证，认为无论从敌情、地形和群众关系哪方面讲，南下浠水、黄梅、广济这条作战路线比进击安庆都较为有利。于是，红四军领导一面将意见向中央分局报告，一面举兵南下。一个多月，歼敌7个多团，生俘5000余人，连夺浠水、广济、罗田等几个县城，使九江、武汉之敌大为震惊，牵制了原拟开往江西攻打中央苏区的敌军部分兵力，有效地支援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但是张国焘接到改变作战计划报告后，完全不顾事实和效果，连续写信给曾中生、徐向前，指责他们改变原来的东进计划是“抗拒分局指示”、“放弃帮助中央根据地的任务”、“重复立三路线”等等，强行命令部队立即返回。这时，红四军与张国焘的斗争已白热化，形势异常严重，为了得到党中央的支持，曾中生和徐向前向党中央写信，申明南下和东进的是非曲直，利弊得失。为顾全大局，红四军只好按照张国焘的要求北返。途中，许继慎倡议召开干部大会，明确红四军的行动方向。9月4日，军部在英山县鸡鸣河召开全军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干部、活动分子大会，总结南下以来的活动情况，讨论张国焘的来信。会上大多数同志对张国焘莫须有的指责不服，一致通过了向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委上报的《申明书》。《申明书》依照事实据理力争，阐明了部队东进的不利和南下作战的正确性，指出张国焘强行命令红四军北返是错误的，不利于红军发展和战斗，不利于支援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张国焘接到《申明书》后，大为恼火，宣布鸡鸣河会议是“改组派起了大作用”的反党活动。于是中央分局和军委会在张国焘的操纵下，举行紧急联席会议，错误认为“现在曾、许竟到了公开反抗的地步，那是他们的执迷不悟”。并决定，撤销曾中生的红四军政委职务，派陈昌浩作为中央分局和军委会的全权代表，迅速赶赴红四军作战前线，相机处理许继慎。张国焘又以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名义发出通告，宣布“严厉镇压反动是党在目前斗争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任务”。要求红军和鄂豫皖根据地的各级党组织“动员一切同志，一切革命的群众参加肃反的工作”。在发出通告的同时，张国焘利用敌人离间、陷害的信件，炮制了一个所谓“许继慎为首的反革命阴谋案”。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在1931年8月进行英山战斗时，蒋介石手下的特务头子利用和许继慎的黄埔军校的同学关系，派遣特务钟俊和钟梅桥到英山找许继慎。特务头子写了一封信让这两个特务带着，诡称由他转交的所谓许继慎投降蒋介石计划，蒋已批示“照办”，蒋对许“乃复来归，虽犹千里，心实欢喜”等等。许继慎一眼识透了敌人的离间阴谋，当即下令将两名特务逮捕，连人带信送交军部。徐向前和曾中生立即对特务进行审讯，戳穿了敌人的离间伎俩。然而张国焘根本不顾事实情由，把敌人信中捏造的情节作为证据，陷害许继慎。1931年9月13日，陈昌浩奉张国焘之命赶往红四军军部麻埠，宣布撤销曾中生职务，在红四军中进行“肃反”。陈昌浩带领保卫局一帮子人在余子店（今河南省商城县境内）突然将许继慎等人逮捕，押送到白雀



园。还有一些红军干部正在同敌人浴血奋斗中被抓，开始了党内的迫害、镇压和屠杀。9月底，张国焘亲自主持在白雀园开展“全力肃清红四军中之反革命和整顿四军”工作，开始了大规模的所谓“肃反”运动。对许继慎和其他许多同志施以严刑拷打，强迫交代问题。他们利用一些人在严刑逼供中“交代”出来的没有事实根据的“口供”，胡编乱造，给许继慎罗织了许多罪名：什么“改组派、AB团、第三党在红军中……组织了一个领导机关，反革命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共九人，……主席是许继慎”；什么许继慎等“确有准备把部队拖到长江边投降蒋介石”的计划，力主红军南下作战，是“他们的策略阴谋诡计”；什么许继慎等人策划了一个暴动计划，在部队北返途中，“决定9月15日在武穴暴动”等等。张国焘为掩人耳目，欺骗群众，达到残酷镇压的目的，竭尽之能事地诽谤许继慎，指使一些人，在城镇街头张贴许继慎一手拿着大刀、一手拎着鲜血直滴的人头漫画，把许继慎刻画成一名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到处用墨汁涂写“打倒第三党分子许继慎”等条幅标语，歪曲事实，模糊群众视线。1931年10月，许继慎在遭到百般折磨之后，被张国焘杀害，年仅30岁。随后，张国焘在红四军中进行全面清洗，凡是和许继慎有过联系，特别是支持过许继慎正确意见的同志，几乎都遭到了逮捕和杀害。一位叱咤风云、功绩卓著的红军将领，没有死在敌人的沙场，反而死在张国焘的屠刀之下，给党和人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刘锡五案

铮铮作响的铁骨

历经国民党法庭、牢狱、死刑的严峻考验和“红色政权”扭打、批斗、冻饿的皮肉之苦，他含冤饮恨而去。那铮铮作响的铁骨，仿佛是一个不屈的魂灵在呼喊。

刘锡五，曾用名刘荣福、刘心平，1904年7月12日生于河南省孟县堤北头村一个商业资本家的家庭。1924年8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春，到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读书。同年10月转为中共党员，任上海大学党支部干事。1926年10月，参加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1927年1月，经组织批准回河南孟县，组织指挥全县三千



农民群众缓征捐税的示威游行，迫使县长同意年内不捐款的请求，取得了20万元捐税一拖了之的胜利结局。1927年3月至12月，在上海闸北区领导上海大学党支部工作。1928年至1930年，代理上海沪西区书记，任江苏省委组织干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1930年夏，任中共满洲局代理职工部长。同年冬，任全国总工会华北特派员兼任全国铁路总工会党团书记。同年12月当选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顺直省委委员。1931年张金刃非法成立“第二省委”，他领导北平市委同张金刃分裂北方党的行径进行坚决斗争，使其阴谋破产，维护了党的统一。1931年7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判刑8年，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同年冬，任监狱党支部委员。参加绝食斗争，抵制了敌人反省政策。后被敌人改判死刑，仍坚贞不屈。1937年经党中央营救出狱。同年春赴延安，任中央组织部干事，地方工作科科长，训练班主任。1939年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北方局委员，做了大量组织、干部工作，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1945年8月，任东北西满二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嫩江省委书记、军区政委、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吉林省委书记、军区政委，一直到1948年冬。1949年夏至1952年夏，调任吉林省委书记。1955年3月，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1956年9月，党的八届一中全会，再次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从1955年至1966年“文革”前，他在中央监委常委集体领导下，为严肃党纪，端正党风，做了大量工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一些错案甄别平反，恢复名誉，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江青、康生把矛头指向中央监委：诬蔑中监委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据点”，必须“彻底砸烂”，将中央监委60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49人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刘锡五，常委吴溉元、王世英及杨之华等党的忠诚领导干部惨遭迫害致死。

1967年，江青、康生一手策划，掀起全国范围的“揪叛徒”高潮。1967年3月16日，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操纵，以中央的名义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别有用心地制造了轰动全国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刘锡五同志也成为“大叛徒”。事情的真相是：

1931年7月，刘锡五同志因叛徒出卖被捕。在法庭上，他镇定沉着，坚决勇敢，同敌人和叛徒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顶住了敌人诱降、拷打。因此，被宪兵司令部判了重刑，判刑8年。1931年秋冬，被送到北平草岚子监狱，开始了长期的监狱斗争生活；同年冬，监狱里成立党支部，刘锡五积极参与建立党支部活动，并担任支委。在支部领导下，他积极完成支部交给的任务。1934年12月，为粉碎敌人的反省政策，改善生活待遇和学习条件，党支部决定进行绝食斗争。刘锡五同薄一波、刘澜涛等50个政治犯开始了绝食，一连绝食7天。刘锡五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精神，还要继

续绝食。在难友们病困交加，亟需经济资助之际，刘锡五毫无自私自利之心，把家里寄来的钱物，全部交给狱中支部的生活委员会，接济有病有困难的同志。用高价秘密买报纸，买中外文马列著作。敌人妄图用说教办法使刘锡五等狱中犯人投降的阴谋没能得逞，转而采取高压手法，宣布每6个月审查一次，经过三次审查不反省者枪毙。刘锡五等绝大多数同志在支部领导下，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刀山剑树，横眉冷对，忠贞不屈，毫不动摇。他们向党发誓：“头可断，血可流，誓死保卫共产党员崇高称号，绝不向敌人屈膝投降。”敌人把刘锡五等同志划为死顽固一类。1935年春，国民党宪兵第三团派人打进草岚子监狱，经过一个多月的侦察，察觉到狱中有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在活动，认定其中的“活动分子”，向南京呈报给“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判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刘锡五等12名共产党员死刑。对这些死刑犯集中关押，加上重铐，不许放风，严加看管，等待执行。刘锡五等同志，面对死亡，义无反顾，决心从容就义。刘锡五等同志向党组织庄严表示：绝不玷污共产党员和先烈们的荣誉，等到那一天到来时，要同声高唱国际歌走上刑场。刘锡五等大义凛然的英勇气概，极大地鼓舞了监狱全体政治犯的斗争勇气。正在此时，华北局势发生剧烈变化。1935年6月9日，国民党投降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国民党党部及其它国民党机关必须立即撤出北平，宪兵三团也仓促撤出“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刘锡五等12位共产党员才幸免于难。

刘锡五同志从1931年夏到1936年冬，在敌人的魔窟。中经受住6个年头特殊考验和锻炼。正如他给家里亲人写的：“真金不怕火炼。”严刑拷打、欺骗利诱，几经生死，忠贞不屈，粉碎了敌人的“反省”、“转变”等一切阴谋诡计，锻炼了意志和对敌斗争的胆略和策略。他克服了许多困难，学习了大量马列著作，难友们称他为学习马列的“老学究”。刘锡五等同志6年的监狱生活，是战斗、学习锻炼的6年，从而对出狱后承担革命重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6年，抗日运动日益高涨。各地斗争急需一批党的干部来领导，否则，无法满足革命形势的需要。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北方局认为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同志是一批宝贵的革命财富。因此，1936年4月北方局决定由党组织承担责任，组织营救出狱。北方局的报告，经中央书记处讨论批准，并指示由北平党组织全力营救。当时狱中有组织关系的并按照中央指示出狱的只有57人，刘锡五表示服从组织上的决定，但生怕上了敌人的圈套。为慎重起见，刘锡五要求第一批出狱的同志进一步核实情况。如确是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即给他送一只烧鸡来。不然的话，他决不上当，宁愿把牢底坐穿，也不玷污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后来，情况得到了证实。刘锡五这才打消顾虑，最后一批走出敌人牢笼。刘锡五按约定出狱后就由中共中央北方局介绍去了延安。这就是刘锡五等61人被捕、关押直至出狱的始末。所谓“大叛徒”，纯粹是林

彪、江青、康生一伙横加在刘锡五同志头上莫须有的罪名。除了历史上的“大叛徒”外，他们还罗织罪名，诬蔑中央监委成立11年来刮的是“阴暗风”、“翻案风”，刘锡五同志自然成了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分子”，遭到了批斗、打骂、歧视、体罚、专政等一系列迫害。

林彪、江青、康生及其爪牙，对刘锡五同志政治上迫害，生活上非人道的摧残，真可谓竭尽虐待折磨之能事。一天深夜里，一群造反派到刘锡五同志家挂毛主席像，他们硬逼刘锡五同志跪着向毛主席像“请罪”。刘锡五同志不跪，硬是强迫其跪，结果折腾一个通宵。刘锡五被折磨的精疲力尽，腿痛的站不起来，由上小学的儿子搀扶起来。家里东西全被打翻，门口张贴着“打倒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刘锡五”的大字报和标语。造反派对刘锡五二遍又一遍地抄家，直至把刘锡五家里洗劫一空，还把刘锡五家里的字画、古玩等细软，拿到中央监委机关当“罪证”展览。他们限制刘锡五的人身自由，不准他回家，不准同家属见面。每天吃饭由造反派押看同中监委、中组部的其他受迫害的领导干部一起到食堂吃冷饭冷菜。刘锡五胃不好，一次趁看餐人员不备，要爱人何真弄点酵母片。结果被发现，把何真同志撵出宿舍，不准她再到食堂见刘锡五。规定她每月只准送一次“次烟”，由造反派转交。1967年“一月风暴”后，中央监委机关造反派把刘锡五及其家属撵出家门，搬到中组部办公厅副主任高应元家里，与王从吾、高兴元三家合住一单元，每家只给一间小屋，由造反派看管，限制行动自由。同时，还经常地批斗，强令交待所谓“罪行”。

刘锡五对造反派的揪斗，横眉冷对。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抓叛徒战斗队揪斗他时，他不畏强暴，不怕批斗，藐视高压，毫不在乎地插着手，眯着眼，大讲自己的革命经历，讲在草岚子监狱中绝食斗争的坚决态度。刘锡五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陈述自己登启事出狱是组织决定的，党组织的决定是组织纪律问题，要绝对服从。因此，他申明，他的行动与过去别人写反共启事出狱是截然不同的。

刘锡五对社会上外调人员的逼供，给予针锋相对的斗争。刘锡五因为没有按照专案组外调人员的要求去说、去写，遭到他们的武斗、打骂。每次从外调人员那里返回，头痛异常，血压升高。但他对爱人何真说：“我要坚持党的原则，实事求是，要对党对同志负责，不能乱说乱写。”他叮嘱何真说：“你回二轻部劳动，不要参加那些所谓的‘革命群众组织’，要警惕坏人利用群众无知。”

1967年，康生直接插手中组部、中央监委的运动。康生控制、其老婆曹轶欧指挥了中组部业务组。从此，对刘锡五的迫害折磨步步升级。他们设立了刘锡五专案组，进行有组织、有计划地迫害。召开各种形式的批斗会，大搞逼供信。造反派把刘锡五当作“叛徒”批斗，逼迫勒令他交待所谓“叛徒”、“反党”罪行，刘锡五决不承认。当专案组的人围攻逼迫，硬要他承认是叛徒、特务时，他冷笑一声，昂首望天，不屑

回答。于是造反派就说刘锡五态度不好，进行所谓“打态度”，直至搞体罚，“坐飞机”，弯腰低头，拳打脚踢进行武斗。刘锡五同志仍然坚持真理，不向邪恶势力低头。一次，批斗会结束后，刘锡五对一位同志说：“不要看他们这样猖狂，他们长不了。要相信党相信党中央，六十一人问题，总会有正确结论的”。从而表现了刘锡五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硬骨头精神和共产党员大无畏的气概。

在“十年浩劫”中，刘锡五同志的冤案，株连九族。刘锡五的爱人何真于1939年参加革命，1940年入党，是在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的。1946年经李富春同志介绍同刘锡五结为革命伴侣。当刘锡五被打成“叛徒”，“走资派”之后，何真同志饱受了株连之害。先将：她关押在中组部空房批斗20多天，后与刘锡五一起隔离，有时陪丈夫挨斗。并戴上“叛徒老婆”的帽子，挨二轻部造反派揪斗，监督劳动，打扫厕所。刘锡五同志的儿子刘载文当时是小学生，因受“大叛徒”爸爸的株连，在学校被同学们当作“黑五类”的崽子打骂凌辱。后被迫离开北京，到广西南宁市一个亲戚家寄居借读。

1969年3月，江青、康生一伙不顾刘锡五身患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症、脊椎纤维瘤手术后遗症、右肢萎缩、慢性肝炎等疾病，强令他到吉林省白城市地区双岗草原中组部“五七干校”监督审查，强迫劳动。临出发之前，造反派通知何真送棉衣到中组部门口转送，不准与家属见面。何真给中组部军代表（业务组）写信，要求与刘锡五同志见一面，送些衣物。后来，在两人监视下，准许他俩在中组部接待室见了半小时。何真还给刘锡五带了一根拐杖，结果被造反派训斥为：与“叛徒”划不清界限，还想变天，当官作老爷。

双岗“五七干校”地处一望无际的盐城草甸，荒凉少有村庄。那里气候条件恶劣：冬季严寒，狂风呼啸，冰天雪地；春季狂风大作，飞沙走石，遮天蔽日；夏秋两季，蚊虫肆虐。身患多种重病的刘锡五同志从北京赶出，流放到双岗子时，住在集体宿舍，病情日趋严重，生活不能自理，夜间外出解手，跌倒在地，爬不起来，手脚冻僵，走路困难。不久就大便失禁，刘锡五给何真去信，要求何真去见一面。何真当时下放到江西省农村“五七干校”劳动。何真同志得知刘锡五病重，自动要求到双岗照顾刘锡五同志。何真来后不久，就到夏季。此时，刘锡五同志大小便已失禁，床上、裤子里都有大小便，吃饭时食物往外流。刘锡五不仅得不到治疗，还被强迫劳动，下地看猪、看菜园，不准他坐凳子。冬天，造反派不许刘锡五用连队里的草烧炕取暖，无视他病重的情况，让刘锡五自己拾粪、拾柴取暖。致使刘锡五挨冷受冻，病情严重。1969年冬林彪下了一号命令，时局紧张。江青、康生一伙胡说什么“中组部‘五七干校’这批人，如被苏修掳去，其害无穷”。因而，对被监督劳动审查的对象更严加看管；对刘锡五的折磨迫害，也愈来愈甚之。1969年冬季的一个深夜，造反派把



刘锡五夫妇从屋里叫起来，押到宿营地外边的雪地里，不准他们动，也不准拿衣服和被子，穿着单薄的衣裳蹲着，直到天亮才让回屋。原来，这是干校统一布置的军事演习。经过通宵达旦的严寒袭击和折腾，刘锡五的腿被冻坏了，双腿肿大，步履蹒跚，病情进一步恶化。同年年底，干校决定迁往河南省长葛县。白城地区的12月份，正是冰天雪地的严冬。搬家前没有通知刘锡五夫妇，说搬立即走人。从兴东大队到双岗子火车站，没有汽车，坐马车要走几个钟头。马车上装载着行李和其它东西，别人都靠下面坐，唯独让刘锡五夫妇坐马车顶头上，马车走动时顶端乱晃荡，刘锡五的两只手得时刻紧紧握住捆行李的绳子，一不小心，就会跌下来。到火车站时，刘锡五的双脚全部冻僵，站不稳，立不住，不能行走，只能靠何真搀扶才上了火车。在火车上，刘锡五夫妇也被打入另册。别人都是一人一个铺位，唯独他们夫妇只许合用一个铺位，白天还不许睡觉。这样，经过数天旅途的艰辛，一路折磨，刘锡五同志病情更加严重了。

迁到河南长葛农场的刘锡五夫妇，过着非人的集中营生活。刘锡五有时神志不清，白天黑夜不辨，生命垂危，时刻需人照顾。当地农村多是苦水井，不能做饭，何真需到几里远的地方担甜水给刘锡五做饭吃。回来时，刘锡五从床上跌到潮湿的地下，起不来，叫不醒。眼见刘锡五病情恶化，何真偷偷用架子车把他拉到公社医院看病。一位70多岁的老中医诊断说，刘锡五病重，要赶快治疗。并给他针灸。第二次再去医院，老中医不敢再治疗，说：干校来人调查，追问刘锡五来看病一事，告知刘锡五有问题，不让给看病。何真同志无奈，只好求中组部干校医生。医生说：刘锡五是叛徒，不给针灸。结果给了何真一枚针，让何真自己扎针。何真不会针灸，急的直哭。刘锡五劝她：不要哭，困难是暂时的，等冬天过去病会逐渐好转。在求医无门的情况下，何真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要求给刘锡五治病。不久，干校通知，送刘锡五去许昌医院看病。诊断结果是病人血压已达240，无法治疗，只好返回干校。后来，何真向干校军代表提出，去郑州医院。又拖延了一段时间，才把刘锡五送到郑州医院。医生说，刘锡五是“叛徒”，只给了降压药应付。何真气愤之下同医生争吵起来。刘锡五听到后一切全明白了，生路无望，眼前只有死亡的道路，“望图不怕铁窗寒，唯恐冤情辩罪难”，对于死，刘锡五是无所谓。但他死不甘心，因为自己的冤情尚未昭雪。然而，时光不等他了。临终前，刘锡五语重心长地对何真说：“我生是共产党员，死也是共产党员。我们党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实事求是的党，将来‘六十一人’事情总会弄清楚的。我死后，你要振作精神，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1970年2月28日晚上，刘锡五同志含冤饮恨，与世长辞。刘锡五同志死在医院，没有人给穿衣裳。第二天，何真同志从洗衣店取回几件旧衣裳，只身一人到太平间给自己的革命伴侣、尊敬的师长——刘锡五同志最后一次穿衣服。干校头头说，刘

锡五是“叛徒”，火化后不要骨灰，何真同志自己出钱，把骨灰取出，寄在刘锡五同志老家妹妹那里。

刘锡五同志在白色恐怖中，没有倒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也没有屈服于敌人的法庭。然而，在自己为之浴血奋斗赢得的红色政权下，却被林彪、江青、康生一伙，从背后捅上致命一刀含冤而死。

1976年，我们党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反党集团，结束了十年动乱，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终于澄清了“六十一人案”的事实真相：1967年3月16日，在林彪、江青的策划下，以中央的名义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把1936年薄一波等同志执行组织决定出狱定为“自首叛变”，这是一起重重大错案。1931年前后，由于敌人搜捕和叛徒出卖，薄一波、刘澜涛等党的许多重要干部在北方被捕，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他们在狱中坚贞不屈，组成党支部，领导被关押人员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崇高的品质和高风亮节。1936年，刘少奇同志主持北方局工作，根据当时华北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迫切需要，经中共中央批准，指示狱中的同志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以便迅速开展斗争。薄一波等同志出狱后，立即同党组织接上关系，党组织及时分配了他们的工作。对薄一波等同志出反省院问题，党中央数次作过严格审查，康生于1943年亲自参加过中央讨论这个问题的会议。1944年，康生向延安党校作报告时，也专门讲过，党中央一直认为没有问题。可是“文化大革命”伊始，康生一伙为了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于1966年9月16日，把这件事重新提出来，硬是诬陷薄一波等同志为“反共叛党”。到1967年，由于薄一波等同志已被当作“党内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分子”打倒，由于“左”倾错误的发展不能历史地看待这一问题，因而康生的诬陷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此后，在江青、康生一伙的煽动下，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了“揪叛徒”之风，由群众组织任意推倒组织对在白区工作过的、被捕过的干部作出正确的结论，重新审查甚至刑讯逼供，江青康生等一伙人无中生有、罗织罪名、残酷迫害，到1967年6月，全国有5000多人因“叛徒”问题受审查。刘锡五等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长期遭受折磨，含冤去世。

1979年1月25日，党中央在北京为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的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5位同志举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追悼会，追悼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同志主持，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及各界人士12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刘锡五同志参加革命46年，历经了法庭、牢狱、死刑、战争的严峻考验，遭受了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迫害和摧残。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他都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必定胜利。他既具有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又具有



铮铮铁骨的大无畏精神。

刘锡五同志冤案真相大白于天下，含冤而死的刘锡五同志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评价，给他恢复了名誉。历史终于给他以公正的结论。刘锡五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不息的一生。刘锡五同志虽然被迫害致死，但他虽死犹生，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孙维世案

酷似“太阳”的锁链

这位执着追求光明的杰出女性，在《初升的太阳》下，被另一位“杰出女性”推上鬼门关——惨不忍睹的尸体上，还锁着那酷似两个小“太阳”的锁链。

1968年10月14日，优秀共产党员、杰出的无产阶级戏剧家孙维世同志，被“四人帮”迫害致死于狱中。

孙维世从小就受到革命的熏陶。她的父亲孙炳文，是朱德同志的至交，也是周恩来同志的战友，曾接任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并兼任总教官。1927年因汉奸告密，被捕入狱，英勇牺牲。孙维世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把她视为自己的女儿，常常对她进行教育和鼓励。1939年孙维世到苏联学习，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戏剧学院表演系和导演系。1946年回到延安，她深入群众，参加土改，在前线用文艺的形式宣传党的有关政策。全国解放后，她是全国政协第一、二、三届委员，几次出国从事政治活动，但她主要的还是从事戏剧工作。她翻译介绍并导演了多部有关欧洲古典名著和俄罗斯著名戏剧家的剧作。孙维世同志历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总导演、副院长，中央实验话剧院的党总支副书记、总导演、副院长并兼任中央戏剧学院导演干部培训班班主任等职。

1964年她响应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重要批示，到大庆安家落户，深入到职工、家属中去，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满怀革命的热情写出了歌颂大庆家属闹革命的话剧《初升的太阳》，得到了周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的热情肯定和鼓励。可是正是这个好





戏，却被自封为“革命文艺旗手”的江青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江青一伙曾窜到油田，对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铁人王进喜施以法西斯酷刑，硬逼他承认大庆红旗是黑的，铁人回答：“把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也不承认。”“四人帮”处心积虑地要把大庆红旗拔掉，并把《初升的太阳》这个剧和它的编导者孙维世连人带戏一齐消灭。

江青为什么要陷害孙维世同志呢？这还得从30年代开始说起。

1935年，上海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任锐同志曾将14岁的孙维世同志改名换姓，隐蔽在党所领导的“东方剧院”，后来又先后将她隐蔽在“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和它的后身“上海业余剧团”，当时江青也在这后两个团体之中。因江青心术不正，生活糜烂，维世对她比较疏远。

1937年，孙维世在延安学习，江青也混进延安，并对维世同志表示非常“亲热”，孙维世很警惕。1946年，孙维世从苏联学成回国，江青曾找上门来，她问维世：“你看我现在怎么样？”孙维世不明其意，反问：“什么怎么样？”江青不冷不热地哈哈一笑，指着孙维世说：“你这个草包……”，经她这么一笑一指一骂，孙维世就只好说：“很好啊……”不料江青突然把面孔一板，阴沉地说：“一点也不好，我吃够苦了哩，我一定要收拾他们……”孙维世听了十分惊讶，不懂她所指何人何事，接着江青又假惺惺地向孙维世表示什么，你是周副主席、邓大姐的女儿，我是夫人，以后，要好好“团结”。孙维世沉默不语，深感此人居心叵测，难以捉摸，从此对她更加疏远。

1950年孙维世跟随主席和周总理从苏联回国后，一贯伪装不问政治的江青一再要孙维世去看她，孙维世没有去。同年，孙维世结婚（维世的爱人是著名表演艺术家金山同志），江青也来参加婚礼。一在婚礼上江青问孙维世：“为什么不上我那里去？”心直口快的维世反问到：“有什么事？”江青说：“不就是讲讲你跟主席出国的事情嘛。”有关毛主席的事，是党和国家的机密，江青为什么一再要打听？孙维世当然不去。

1964年，孙维世从大庆返京向总理汇报工作时，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总理召集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座谈会，意外地发现江青坐在身旁——那时江青已经借搞革命现代京剧为名，开始插手文艺界。她叫了声“维世”，低声地威胁她说：“你排了不少戏哩，有没有问题啊？！这下该到我那儿去了吧。”但事后，孙维世还是不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告诉林彪的死党叶群说，孙维世是她的仇人，要叶群把孙维世抓起来。他们的交换条件是江青也替叶群抓仇人。从1967年开始，迫害孙维世同志的行动开始了。

1967年，大街上出现了反对陈毅副总理的大字报。一批来历不明的所谓“外调”人员要孙维世“证明”陈毅副总理反对毛主席。孙维世说：“我不知道，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外调”人员说：“陈毅是应该打倒的。你对陈毅是什么看法？”孙维世



说：“陈毅副总理热爱毛主席，身经百战，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大功臣。”

大街上又出现污蔑朱德委员长的大字报。又有一批来历不明的所谓“外调”人员多次逼迫孙维世说：“你要交待同朱德的关系，应该揭发朱德。”维世回答说：“朱德同志是人民军队的总司令，是毛主席的老战友。我非常尊敬他，没有什么可揭发的。”一个深夜，又有两个所谓“外调”人员闯进孙维世的家，先把朱德委员长诬蔑了一顿，然后逼着孙维世“交代”同朱德委员长的关系，“揭发”朱德委员长的所谓“罪行”。孙维世忍无可忍，拍桌大骂，把两个所谓“外调”人员赶出了大门。

又一批来历不明的所谓“外调”人员逼着孙维世揭发她的胞兄、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孙泱同志的所谓“特务罪行”。孙维世问：“你们有什么根据说孙泱是特务？”“外调”人员气势汹汹地说：“是首长江青当众宣布的。”维世冷笑了一声，不予回答。

差不多同一时期，街上贴出许多诬蔑大庆铁人王进喜同志的大字报，胡说王进喜同志是“假标杆”，是什么“国民党”……孙维世非常愤怒。

一个清晨，北京城里又突然发生一件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长安街上竟然出现了诬蔑八亿人民敬爱的周总理的反革命大字报，紧接着又有一批来历不明的所谓“外调”人员逼孙维世“交代”关于周总理的事情。他们连骂带讽刺地反复追问，把嗓子都叫嘶哑了。孙维世始终一言不发，拒绝回答。

孙维世不明白，这许多来历不明、行动诡秘的所谓“外调”人员究竟是从何而来，他们为什么敢于这样猖狂地诬蔑、攻击陷害毛主席的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们，敢于打击迫害身经百战的老师们，还有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和老干部呢？她为此常常彻夜不眠。

在这段时间里，她曾给江青写信，针锋相对地诉说孙泱不是特务，要求中央文革调查澄清。上书没有回音。1967年秋，江青、陈伯达等在接见红卫兵时，异口同声地污蔑长期在朱德总司令身边工作的孙泱同志是“特务”，江青变本加厉地说什么“孙泱是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国民党特务”。这伙真正的叛徒、特务讲话几天后，孙泱同志被迫害死于人民大学。孙维世也曾为大庆铁人王进喜同志遭受迫害而上书敬爱的周总理，说明王进喜同志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工人阶级先锋战士。不久，王进喜被解放来北京。王进喜来北京后，冲破反革命阻挠，设法找到了孙维世，并说，“是毛主席、周总理救了我，周总理已经接见了我……”不料话音刚落，有人唆使不明真相的群众闯了进来，把王进喜同志轰出了大门。

1967年12月的一天，突然有六七个公安人员来到孙维世家，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抓走了孙维世的丈夫金山。从这时起，金山与孙维世永别了。他们在孙维世家里翻箱倒柜，大肆搜查，把许多珍贵的革命文物，如孙维世珍藏的当翻译组长时和